

27

中国历史 必读知识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全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支长歌悠悠远涤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一支长歌悠悠远涤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二十七)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九章 清代历史卷

清代历史纪事

帝师梁鼎芬	(3405)
王国维之死	(3411)
保圣夫人承祀案	(3414)
颐和园的开放	(3415)
开放东、西长安门	(3417)
紫竹院	(3418)
剪辫子	(3419)
溥仪的“后半生”	(3420)
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3433)
法国画家王致诚	(3436)
波希米亚画家艾启蒙	(3438)
护法战争	(3440)
江浙战争	(3445)
第二次直奉战争	(3449)
国民革命军东征	(3454)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3457)
奉浙战争	(3458)
郭松龄反奉之战	(3462)

第十章 中国近代史卷

中国近代历史概况

中华民国	(3469)
中华民国的创立	(3469)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	(3473)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3477)
国民党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3485)
抗击日寇	(3490)
南京国民政府垮台	(3498)
北洋政府	(3505)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 ~ 1916)	(3506)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 ~ 1920)	(3507)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 ~ 1924)	(3509)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 ~ 1928)	(3510)
临时执政府	(3511)
北伐战争	(3512)
战争的准备	(3512)
战争的胜利进军	(3513)
战争的成就与夭折	(3516)
国民政府(粤、汉)	(3518)
南京国民政府	(3520)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3520)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及其演变	(352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军事、文化	(3524)
中国共产党	(3526)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352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528)
抗日战争时期	(3530)
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3532)

帝师梁鼎芬

梁鼎芬，字节庵，广东番禺人，与简竹居等师事陈兰浦先生。光绪六年（1880年）入翰林，时年二十二岁，任职为翰林院庶吉士。四年后，中法战事起，他上疏弹劾李鸿章——原来，从光绪初元以来，中外交涉迭起，有英国的马嘉理被杀案、日本侵犯我琉球台湾案、俄国侵占我伊犁久不归还案、英法侵略缅甸、越南案等等。简单地说，都争先恐后东来攘夺中国的土地权利。而清廷一班顽固守旧的朝士大夫没有认识这是“三十年来变局”（李鸿章语），只是盲目地叫嚣“攘夷”“以战驱夷”，而老成持重，主张忍耐以埋头自强建设的人士，如恭亲王及李鸿章，往往就被这纷嚣的舆论无情攻击。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宝鋆已因这种“清议”而被黜了，但身当交涉要冲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仍安然在位。原来，梁鼎芬在这年初，曾由顺德李文田替他看过相，说他流年不利，将有大危险。因此，他想不如做一件冒渎大官的事，或许可将这不利流年“冲喜”一下。于是，就慷慨其辞地以“六可杀”的罪名，请求皇帝将李鸿章“明正典刑”。这一奏是关系到梁鼎芬一生浮沉的大文章，也是有关李鸿章毁誉的一大文字；因为李鸿章一生因洋务负谤最甚，但说他“该杀”却是梁鼎芬这一奏疏为破题儿第一遭。现在特摘录如下：

为疆臣骄横好恣，罪恶昭彰，吁恳特旨明正典刑，以申国法，而纾众愤，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自法越构兵以来，朝廷保卫藩服，一再出师海疆，大臣应尽力筹防，有备无恐。迨来外间喧传，法舰甫到烟台，李鸿章遂有飞章乞和之事。凡有兴气，无不闻声唾骂，指为奸邪。臣谨将其罪恶昭彰者一一为皇太后皇上敬陈之：洋务之兴，办理海防之任，李鸿章为最久，其受恩亦最深；使果能感激驰驱，

则二十年筹饷筹兵，早有成效，何至法舰甫到，遽行退缩，隐忍求和，视君恩如弁髦，置国体如敝屣；其可杀之罪一也。李鸿章保举洋务人才，不下百数十辈，朝廷以海防为重，无不优加录用，冀济艰难，故洋务人员升薪迁俸至为优异。今日有事，所谓能办机器者何人？徒令国家破格求才之心，适为该督植党营私之计；其可杀之罪二也。天津、上海皆由李鸿章设立机器局矣，设立之意非所以求精器械以备不虞者哉？综计每年开销皆数十万，若购铁甲船，则一只亦需数十万；朝廷不惜帑项之重，筹划之艰，凡经奏请，无不允准。今该督临事畏缩，是前此浩费非归无用，即饱私囊，外削民膏，内伤国帑；其可杀之罪三也。李鸿章以母忧去位，惟时朝鲜之变未巨，安知即能回任？乃敢令伊妻赵氏盘踞直隶总督衙署，不使奔丧。张树声系该督之母义子，又为该督门生，甘心愿受，及至夺情起用，办理防务又复一年，仍无把握；苟其自知罪恶，早请罢斥，天下之大，岂无能胜之者？乃延宕至今，既无可战，亦无可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其可杀之罪四也。向者俄事之急，系李鸿章出而议和，方以夷氛正炽，徐图补救为言；今数年矣，补者何事耶？由此观之，前谓补救者既是空言，今所谓补救者亦断无长策。摧折士气，逞其鬼蜮之术，甘作夷蛮之媒；其可杀之罪五也。伏读三月十七日谕旨，陈德贵、党敏宜皆斩，唐炯、徐延旭皆拿问。斩首者以其失炮台及退缩不前也；拿问者以其迁延不进与夫私行退兵者也。今李鸿章以畏葸为秘策，以欺诈为孤忠，罪浮百倍，不杀之则死者有辞矣。我朝法令至严，自荣厚释放后，吏多玩志，实自李鸿章启之。今唐炯、徐延旭业经拿问，若不先治李鸿章之罪，势必唐炯、徐延旭之生，臣恐自此获咎人员，争思开脱，又将何以防之？疆臣欺妄，军将退避，又将何以治之？惩一警百，正在此时；其可杀之罪六也。

……臣新进少年，本无言责，幸当言路广开之日，又值时艰孔亟之秋，敢献争夺茆，不辞斧钺……（下略）

梁鼎芬这份奏疏，用意立言都不免有些过于偏激。李鸿章固然办理洋务海防最久，二十年来，这些虚骄议论都是对李鸿章自强新政的最大阻力，使他不能放手去做。正因此而致“先时无备”，不得不“遇事必和”，以争取时间来埋头国防建设；苦心孤诣，一般人哪能了解。

鼎芬奏疏经翰林院掌院学士代为转递后，慈禧震怒，朱批“后生新进，妄议大臣，交部议处”。部中人想讨好李相，竟议以降五级调用。鼎芬的本职为翰林院庶吉士，是七品官。清代官制，虽有一品到九品正从之分，但降官降正不降从，计七品庶吉士降五级已无可降了。所以鼎芬就在家门前的灯笼上写了“革职翰林”四个字，引以自豪；时年仅27岁。

鼎芬被罢黜后，即赴焦山海西庵读书数年，曾又到无锡拜高先生祠，有诗：“病夫再拜漆湖祠，泉梗兰花似旧时，二十七年无一一是，得名太早读书迟。”为谪官后之作，颇多感慨。

光绪十六年四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聘请名师执教，不设山长，以博约兼资、文行并茂为施教方针，为乾嘉以后汉宋学派的结局：斟酌于书院学堂之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后来学校的先声。鼎芬和屠寄、易顺鼎诸氏都受张之洞的礼聘到书院担任主讲，而鼎芬在此用力尤勤。后来又协助张之洞创办湖北文学堂和讲武堂等，并依据张之洞的《勤学篇》，分别编撰各种经史读本。可以说张之洞在湖北的一切新学务设施，大都倾注鼎芬的心血。因此，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各文武学堂开办均超过十年，毕业生有三千人以上，特奏请朝廷奖励任事各职教员，其中说：“梁鼎芬办理学务多年，擘计精详，勤劳最著”，请特予褒奖。而当时湖北毕业生多为各省争先罗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在京致电梁鼎芬：“好学生总不为鄂用，湖北何以立于南北之冲乎？”这是高兴之余的

牢骚话。因为当时张之洞已因兴办学堂的成绩而博得“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声誉了——而这一半要归功于鼎芬的努力。

鼎芬在鄂办理学堂的确造就了不少人才，如黄兴先生等就是“两湖书院”的高材生，同时也结识了一些积学之士如杨守敬等。他与章太炎之间也有一段佳话：原来，当光绪二十四年春，太炎因夏曾佑、钱恂的推荐而受聘两湖书院，相传一日，鼎芬对章太炎说：“闻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有所闻否？”太炎答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未免想入非非！”鼎芬大骇，便说：“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言？”怫然不悦，便对张之洞说：“章炳麟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之洞乃馈赠太炎路费五百两，命其离鄂。由这一佳话可见梁狂士遇到章疯子也只有自愧不如了。

鼎芬在鄂协助张之洞办理学堂外，又奏请建曲阜学堂，以明人伦，重躬行，中学为体，西学为辅，培养通才为宗旨。朝廷既准其请，并特发内帑银十万两为开办费——这更是中近代设立新学堂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孔门圣地设立新学，足见风气已开通了。

鼎芬埋头办学，是因为“放大炮”后，宦途晦塞，不得不如此，但他似乎始终没有忘情于朝廷。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奔长安，情形颇为狼狈。鼎芬建议张之洞派员驰赴行在恭请圣安，呈进方物，又解饷到西安以济需用。这种言行，表示“澹泊”已久的梁鼎芬又有用世之意了。因此，翌年三月，之洞在遵旨保荐人材时，就特别保奏鼎芬；七月，又特电军机大臣鹿传霖，请即以鼎芬补武昌府遗缺。八月，鼎芬奉旨补授武昌府知府，于是鼎芬又重入仕途了。

武昌府中有斋叫作食鱼斋。三国时孙权的武昌称帝，当时人多主张迁都建业，故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之谣。鼎芬自题楹联“憔悴雨中花，旧事难忘栖风苑；绸缪天下事，壮志消尽食鱼斋”。词甚蕴藉，所许“栖风苑”原是故都某客舍，鼎芬春闱报罢时，挈眷居其中，而与夫人时生勃谿。后来，鼎芬出守武昌，夫人

并未随宦，但每年待等鼎芬生日一到，鼎芬便要身穿官服，开中门迎接夫人；夫人也象服六珈，举案如宾，一宿即行，翌日鼎芬欢送如仪，传为佳话。

辛亥革命，鼎芬不想在民国作官，以遗老自居，与劳乃宣等蓄发如故，并以德宗崇陵工程未竣，奏请守陵；宣统乃任命他为“崇陵种树大臣”。在他奔走之下，上海各地有不少想求得小朝廷的匾额或其他荣典的人，大捐其钱，供奉完成崇陵的工程。鼎芬发誓要在陵前结庐守陵，以终结晚年。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在灯下看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闯进屋里；他面不改容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死在先帝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

鼎芬在崇陵拍了一张照片，穿着清朝官服，身旁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但他没有实行终老于陵旁的誓言，不等松青就跑进城去了。

民国三年的冬天，光绪和隆裕后“奉安”在梁格山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溥仪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大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山东巡抚、袁世凯国务院的国务员孙宝琦；此时，他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时代的名臣之一）。那天，这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来到祭台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礼。孤臣孽子的梁鼎芬一时大为兴奋，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有穿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得怔住了，

旁边的人也给弄得莫名其妙。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点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作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你是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这一唱一和，引来了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这幕话剧真演得有声有色。

“结庐守陵”、“凜然退刺客”、“捉弄孙宝琦”，可算是鼎芬一生中最得意的事迹。

民国初年，新会故吉林巡抚陈超常病卒于上海，鼎芬在挽联中写道：“关中见赏鹿尚书（即军机大臣鹿传霖），回思万里驰车，行在烽烟诗一束；地下若逢龙表弟，为道孤臣种树，崇陵风雨泪千行。”颇传诵一时。所谓龙表弟是指顺德龙凤鏢。龙氏辑有《知服斋业书》，书内刊入鼎芬诗四卷，而鼎芬亦有《龙凤鏢表弟问病山居，出示见怀诗，依韵答谢》六首，其末一首写道：“明月身何处，他时帝何如：爱如犹我弟，奉母且闲居；旧宿三间屋，新钞百卷书；人间程懿叔，消息未应疏。”也可见他们二人的情感是何等深挚了。

民国五年，黎元洪特荐鼎芬为逊帝溥仪师傅，以为鼎芬的学问可以“辅弼圣德。”这一年鼎芬生日，溥仪做了几句祝寿诗，写道：“进讲忘炎暑，清风入座凉，年年当此日，介寿共称觞。”鼎芬将它摄成影片，分赠亲友。那时溥仪还是童年，诗也幼稚得很。民国六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时，鼎芬竟为溥仪游说黎元洪，遭到痛斥，被逐出府外。陶菊隐批评梁鼎芬说是“不明大义而自命为深明大义的所谓遗老。”真是梁氏一生言行的盖棺定论。

鼎芬晚年得风瘫病，颇自荒废。他有一封给友人端仲纲的信，这样说道：“病榻无聊，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观看，惟有作诗而已。诗亦作不好，惟有学白陆体，易成篇，心亦好过。作了便算，多与吾心不合，今不能用心，又不能用力，如此等待，不作可也。”又手书遗言道：“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

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话虽如此，但他于民国八年（1919年）逝世后，他的儿子梁劬和他的表侄余绍宋，搜集他的遗作，刊了诗集四卷，以《春日园林》这首“一水饮人分冷暖，众花经雨有安危，冒寒翠袖凭栏暂，向晚疏钟出树迟，恍是无端感春序，樊川未老鬓如丝”诗最为人所称许。他的书法亦秀逸绝伦，但只宜作小品，施于擘窠大字，则气魄不足了。

王国维之死

关于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近来学术界颇有议论。对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中外学者有四种说法：一是殉清说。最早由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理由是王在投昆明湖自沉以前，曾有“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书为证。二是被罗振玉逼债致死说。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26年6月2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三是总崩溃说。山加籍女学者叶嘉莹1980年提出，说王死“实在是当时以为已经来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总崩溃”。四是多因素说。认为王身上“集中了儒、老、佛、尼采等许多消极悲观的东西”，“精神上肉体上痛苦至极，使他不能自拔”（《文摘报》第一一册、第一一三期）。笔者认为，要弄清王国维真正的死因，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档案史料为凭证，总崩溃说和多因素说尚缺说服力。至于被罗逼债致死说，亦系溥仪被特赦后听到的传闻，未必可靠。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王国维档案的记载，王国维确实是为清朝而沉湖殉身。

王国维对清朝一贯忠心不二，在清末曾任过学部总务司行走，又当过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过着亡命遗臣的生活。1923年4月，由

清末陕甘总督、蒙古贵族升允的推荐，被溥仪召为“南书房行走”。对此王国维异常感激，5月入宫就职，得五品官禄，常侍清废帝左右，尽心竭力为小朝廷效劳。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先至醇王府，后避居日本驻华使馆。在溥仪刚去日本使馆不久，即11月7日，他就向溥仪上了一封“敬陈管见”的奏折，发泄了对民国的极端仇视，表示对清废帝的一片愚诚和寄以无限希望。折中说：“窃自狂贼犯顺，乘舆劫迁，狼子野心，旦夕不测。……今幸上天垂祐，皇上得安抵日使馆。日使处以正寝，礼绝国宾，非徒皇上往日余尊，亦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孰不庆幸。……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蹕之期尚需月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御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而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车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等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敬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宣统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以后为了表示效忠清王朝，王国维还几次要投御河自尽，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当时清华学校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请王国维当院长，初不肯，次年初溥仪亲自劝他去就任，始允充教授。1927年四、五月间，北伐军进抵河南，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对革命十分恐慌，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六月一日写就遗书：“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第二天，即1927年6月2日，亦即丁卯年五月初3日，王国维

又向溥仪上了一封遗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迺者赤化将成，神州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波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遗书用白宣纸墨书，长二十九点五公分，宽二十公分。从遗文和字迹来看，确为王国维手书。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按照清朝的惯例，王公大臣在病危之际或临终之前，须具遗折上呈皇帝，以叙君臣诀别之话。遗折可以自己亲书，也可口授令人代缮。亲书遗折，结尾处一般都写“谨具折奏闻，伏乞圣鉴”等语。令人代缮者，结尾处一般都写明“谨口授遗折，令×××代缮具呈，伏乞圣鉴。”由此看来，王国维的遗折应是王亲自书写。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说：“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笔者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是否是罗振玉假造的呢？经把遗折和罗振玉的奏折笔迹相对照，二者字迹根本不同，故罗振玉假造遗折一说，缺乏事实根据。

王国维的遗书和遗折中充满了孤臣孽子的感情，一方面对逊清皇帝感恩戴德，忠心耿耿，恋恋不舍；另一方面又感到时变境迁，复辟无望，在对“赤化”时局痛心疾首，而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有“自湛清池”，“一洒此耻”。因此，王国维在绝望的情绪中，沉湖殉清。这是他一贯的封建顽固立场和忠君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保圣夫人承祀案

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有保圣夫人园寝一处，是康熙皇帝赐给保姆瓜尔佳氏的葬地。康熙帝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1654年5月4日）生于紫禁城内的景仁宫，其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玄烨出生不久，为避痘疫，即移民于宫外福佑寺（在今北长街北端），以后主要靠乳母瓜尔佳氏抚养长大。后来康熙帝为感谢乳母教养之恩，曾封瓜尔佳氏为保圣夫人。康熙四十年保圣夫人死，康熙帝特在东陵赐园寝一处，埋葬保圣夫人和其夫图克善。在园寝宫门左右，有御碑二通，上有康熙帝亲自撰写的碑文。保圣夫人的碑文：“惟古保母之设，盖择其可者，必宽裕慈惠温良敬慎亚于女师方称德选。其有懋著，乃劳章追录尔劳，用表双碣。呜呼！铭辞报功，礼亦綦重，而赐尔二人尚碑，知我国家之妇官有足媲美葛覃之师氏，而尔亦与有令闻，以宠尔之子孙，不亦休与。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立。”

二百多年以来，保圣夫人墓一直由东陵守护陵寝大臣督率景陵衙门管理。到清末民初时，由拜唐阿恩荣奉祀陵墓，并配有园丁十名，以管理陵地庄田。陵园里自乾隆以来就栽培树木三千多株，松柏参天，挺拔茂密，清亡后由于管理不严，乱伐盗卖，到民国六年只剩下二百六十多株。当时规定凡八旗王公世爵世职的庄田地亩允归私有，并进行丈量陵寝地亩，以划清界线。这时内务府堂笔帖式善保突然提出，他是保圣夫人和图克善的九世孙，要求承祀陵墓，继承陵园树株财产及祭田，并通过内务府带人强行接收陵地。这当然遭到守陵拜唐阿恩荣和园丁们的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以至动武，双方都说自己是保圣夫人的后裔。东陵承办事务衙门也无法调解，最后命令双方族长查证族谱，具结验证。不久双方族长都呈来了禀结。

善保属内务府镶黄旗满洲荣厚佐领下人，其族长文启具结称：

“查瓜尔佳氏候补笔帖式善保，确系保圣夫人九世孙。”恩荣的上司郎上麟祥也具禀说：“查得图克善系恩荣之祖，保圣夫人瓜尔佳氏乃图克善之妻。恩荣系奉祀后裔，原有园丁十名，与恩荣同一佐领。”这样仍然无法判明谁真正是保圣夫人的后裔。后来由于善保多方活动，特别是有内务府大臣作为后台，最后由东陵守护大臣溥钊出面判断：“拜唐阿恩荣所呈次序行辈图式不能成为证据。”“笔帖善保系属保圣夫人瓜尔佳氏嫡支第九世孙。”“善保返怀宗祖，孝行可嘉，准依庄田地亩赏归私有。”最后报到溥仪那里，溥仪批“依议”，就此了结此案。但恩荣仍不服，拒不交出陵园庄田，东陵承办事务衙门最后将恩荣送交护军管理处，强制其服从逊清皇室的判断。

颐和园的开放

颐和园是清代著名的帝王行宫花园，乾隆时名清漪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所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名为颐和园。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破坏，1903年又重修复。全国以万寿山为中心，前山有长廊、排云殿、佛香阁、智慧海等雄伟的建筑。前面有昆明湖，点缀清晏舫、知春亭、十七孔桥等，风景如画。后山有苍林修竹，幽静娴艳。园外和西山、玉泉山的风景联在一起，形成“景外有景，园中有园”美妙壮观的布局。

民国建立以后，这座园林仍为逊清皇室所辖有。在优待清室条件中，曾规定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北洋政府准备把颐和园作为逊清皇室永久居住之地。颐和园本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建造起来的，帝制结束后，理应由人民来享用，因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将颐和园辟为公园。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部份中外著名人士和团体有限制地进行参观。但是园林的管理仍由清室负责。凡中外人士参观颐和园，须经外交部批准，缮给门照，并通知清室内务府后，方准入内游览。以后北洋政府又规定，外国人游览颐和园由外交部缮发门照。本国官绅参观门照改归内务部或步军统